

兀刺海城地望和成吉思汗 征西夏军事地理析

鲍 桐

蒙古族于13世纪初从漠北兴起后,曾先后5次征伐西夏,《元史》、《史集》、《蒙古秘史》、《亲征录》、《西夏书事》等书均有记载,但都较简略,且互有龃龉之处,屠寄《蒙兀儿史记》参考诸书,融汇贯通,考之较详,但可商榷之处仍甚多,不少学者提出过意见。80年代以来所出的《中国通史》(第六册)、《蒙古族简史》、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(第六册)等,对上述有关地理,都有所考校,但矛盾仍很多。王北辰教授《成吉思汗征伐西夏地理考》是近年来较为详尽的一篇专文,但他考证的大多数地望,仍遵旧说,许多矛盾并未解决。陈炳应《西夏文物研究》和吴天墀《西夏史稿》中,对黑水城、兀刺海城地望提出新说,颇有启迪。《中国历史大辞典》“辽夏金元史卷”附图中,将兀刺海城绘在今乌拉特中旗海流图一带,大约就是根据陈、吴的新说绘制的^①。著者近年来考察内蒙古西部地区长城和古城中,有所发现,愿提出一管之见,以补充陈、吴二位之说,并就教于方家。

成吉思汗五次征讨西夏的有关史料中,三次涉及兀刺海城。因此,兀刺海城在哪里?是个关键问题。本文拟先从此入手。

《元史·太祖本纪》记载中,涉及兀刺海城的仅两次,一次是二年丁卯秋(公元1207年),“再征西夏,克斡罗孩城”(即兀刺海城);一次是四年己巳春(公元1209年),“帝入河西,夏主安全遣其世子率师来战,败之,获其副元帅高令公,克兀刺海城……。”^②这是成吉思汗第二、第三次攻西夏战役。

但是,《蒙古秘史》在成吉思汗第五次攻西夏的记载中,却记有“成吉思汗自察速禿(即雪山)起行,克兀刺孩城,自兀刺孩城起行,破朵儿篾该城(即灵州)”。拉施特《史集》也记为“首先占领了甘州、肃州、河州和斡罗孩城”。戴锡章《西夏纪》记为1227年“春,进攻兀纳刺城”。屠寄《蒙兀儿史记》记成吉思汗第五次攻西夏,正文中无兀刺海城,但注中曾加以说明^③。这与《元史·太祖本纪》中所记第五次征西夏最重要的不同处。

关于兀刺海城的地望,《元史·地理志》亦集乃路下注“乃汉之西海郡,居延故城,夏国尝立威福军”。《西夏纪》等书均同此说,并认为黑山威福驻汉居延城,黑水镇燕驻兀刺海城。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绘制的西夏地图,将黑山威福军标在居延泽畔,黑水镇燕军标在肃州(今酒泉)东北合罗川,而将兀刺海城绘在甘肃军司宣化府(今张掖)东偏北,删丹(今山丹县)正北。《中国通史》第六册附《西夏简图》、白滨《元昊传》附《西夏略图》,都

与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相同，唯未标兀刺海城方位^④。《蒙兀儿史记》注中说，“兀刺海城名，见秘史，旧史李恒传同东纪、亲征录。……故城在今蒙古阿拉善额鲁特旗西南之龙骨山北。山与甘州之山丹县接界，蒙古名阿拉克鄂拉”。《多桑蒙古史》在兀刺海城下注云：兀刺海Ouiraca是唐古特话，意为“在长城中的通道”。多桑自注此解引自夏真特书第379页。夏真特乃俄国学者比秋林，别名伊雅舍夫，多桑的当代人。王北辰教授文章中，引上述屠寄、多桑之记、注后，肯定兀刺海城址在龙首山，汉长城遗址的某个通道上。这实际是对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所标方位的具体论证^⑤。

其实西夏黑水镇燕军的地望应在今额济纳旗达赉呼布镇南20多公里的黑水城，而不在肃州之北。

黑水城的地望，早在本世纪初，以科兹洛夫和斯坦因为首的俄、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“探险队”就在这里挖掘大量珍贵的西夏文物而知名中外。1972—1973年，甘肃省文物考古部门组建的居延考古工作队，经过连续几年的发掘和踏勘工作后认为黑水城不是居延城，西夏的黑水镇燕军就在黑水城。从而否定了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、《中国通史》等书附图中所标黑山威福军在居延泽畔居延故城之误。而与《元史》所记成吉思汗第五次征西夏，先取黑水城相吻合。

既然黑水镇燕军在黑水城，那末，黑山威福军驻地又在何处呢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有必要研究西夏军事建置和驻军分布情况。

《宋史·夏国传》载：“置十二监军司，委豪右分统其众。”“有左右厢十二监军司：曰左厢神勇，曰石州祥祐，曰宥州嘉宁，曰韦州静塞，曰西寿保泰，曰卓啰和南，曰右厢朝顺，曰甘州甘肃，曰瓜州西平，曰黑水镇燕，曰白马强镇，曰黑山威福。诸军兵总计五十余万，别有擒生十万。兴、灵之兵，精练者又二万五千”。其军力分布是：“自河北至午腊翦山七万人，以备契丹；河南洪州、白豹、安、盐州、罗落、天都、惟精山等五万人，以备怀庆、镇戎、原州；左厢甘州路三万人，以备西蕃、回纥；贺兰山驻兵五万，灵州五万人，兴州兴庆府七万人为镇守，总五十余万”^⑥。但《宋史》未标明十二监军司方位。

《西夏书事》曰：“监军司以黄河为界，分左右两厢”。并标明了各厢军驻地。左厢神勇驻天都山、祥佑驻石州、嘉宁驻宥州，静塞驻韦州，西寿保泰驻柔狼山北（今甘肃靖远县北），卓啰和南驻黄河北岸（兰州西北卓啰城，今新屯川西北），右厢朝顺驻夏州弥陀洞，甘肃驻唐删县故地（一说甘州），镇燕驻兀刺海城，白马强镇驻盐州，黑山威福驻汉居延故城，东北限北泽，西北接沙碛”^⑦。

《西夏书事》记载，矛盾之处甚多。如夏州、盐州在黄河内，当是左厢军事要地，但却记为右厢。卓啰和南在黄河外，应属右厢，但却记为左厢。自河北至午腊翦山（今乌拉山）七万人，与贺兰山五万人，在十二厢内却无归属。

因此，今人著作，如《中国通史》、《元昊传》等，皆参考各种史籍，对《西夏书事》记载进行修订^⑧，改为左厢神勇军驻夏州弥陀洞，右厢朝顺军驻克夷门（今宁夏三关口），白马强镇军驻婆罗等。但仍有不少问题，如认为“黑水镇燕军驻肃州北境，黑山威福军驻汉居延故城”等，与甘肃考古队考查不符，而驻河北午腊翦山防契丹的七万大军，仍无归属。

针对上述问题，吴天堉先生在《西夏史稿》中说：斡罗孩城的地望，学者有二说：一是施世杰的张掖县北龙首山（蒙古名阿拉克鄂拉），或高宝桢的龙首山山口夏口城；二是岑仲勉

的在后套北狼山山隘北口附近。岑是依括海牙辛特氏, 斡罗孩是党项语“长城中通道”之意的说法认定的。犹称斡罗路。另据克拉普罗罗斯氏说, 元世祖时亚细亚地图斡罗孩则是在宁夏北方黄河大曲之滨, 认定斡罗孩城应在狼山山隘北口附近。吴先生基本采用岑说^②。

陈炳应先生认为: 黑水城遗址既然是黑水镇燕军的驻地, 黑山威福军则应在河套西北隅的黑山地区。其根据是:

第一, 两幅古地图。一幅为《西夏纪事本末》卷首所附《西夏地形图》; 另一幅是原苏联列宁国家图书馆收藏的《西夏地形图》, 曾载《东方国家与民族》1959年第1期。陈先生撰写了《西夏地形图》初探一文, 认为《地形图》绘制了北宋末年宣和年间宋与西夏地形, 可能是清代学者绘制的, 但必有宋、元时期的详细资料或地图做依据。列宁国家图书馆收藏的《西夏地形图》应是出自同一来源, 是同一幅西夏地图的不同抄本。两幅图都标出了西夏十二监军司, 将黑水镇燕军标于黑水城地区, 将黑山威福军标在河套西北。这是正确的。

第二, 《宋史》比《元史》成书更早, 而且有耶律楚材所收集的西夏中央政府的大量档案材料做依据, 应较可靠。《宋史》未说十二监军司的位置, 但是它的排列顺序显然是按照东、南、西、北四个方向的顺序排列的。最后三个监军司是西夏的北部防线的指挥机构, 而且按其次序正好是黑水镇燕在西北, 白马强镇在正北, 黑山威福在东北。与上述古地图所标的位置相符合。

第三, 从军事观点看, 西夏的西部地区, 有瓜州西平、甘州甘肃、黑水镇燕三个监军司, 后来又增设了沙州和会州两个监军司。相反, 东北部面临强邻契丹和鞑靼, 却没有一个监军司, 这是说不下去的。《宋史·夏国传》说, “自河北午腊翦山七万人, 以备契丹……”。明确无误地说十二监军司中有专门备御契丹的。

第四, 十二监军司的名称都是以驻地之地名、方位、山水来命名的。黑水城地区并没有一座“黑山”, 相反, 河套西北部却正好有一座黑山。宋咸平五年(公元1002年), 曾以黑山北庄浪族龙移为安远大将军, 昧克为怀化大将军”。这个庄浪族, “在黄河北”。所以, 黑山威福军应在河套西北的黑山地区”^③。

吴天墀和陈炳应二位先生的论证是很充分的, 结论也是合理的, 不过黑山威福军, 也即兀刺海城的确切地望, 仍未圆满解决。

要解决这个问题, 必须先弄清西夏东部疆界的方位。

《辽史·地理志》“西京道”中有两段记叙: “丰州天德军节度使……太祖神册五年攻下, 更名应天军, 复为州。有大盐泽、九十九泉、设越泽、古磧口、青塚即王昭君墓”。

“天德军, 本中受降城, 唐开元中废横塞军置天安军于大同川, 乾元中改天德军, 移永济栅, 今治是也。太祖平党项, 遂破天德, 尽掠吏民以东, 后置招讨司, 渐成井邑, 乃以国族为天德军节度使, 有黄河……秦长城、唐长城, 又有牟那山错耳嘴, 城在其北”^④。

这两段记叙, 错讹之处甚多。从原文看, 似乎辽丰州和天德军的位置, 仍在唐丰州和天德军旧址, 但其辖境, 却又东包九十九泉和青塚(今呼和浩特市东和南部); 不过牟那山、错耳嘴仍在辖境内。牟那山即乌拉山, 错耳嘴是乌拉山西端, 因山形似错耳而得名。唐天德军在今乌拉特前旗乌梁素海东侧(现已淹没), 正在错耳嘴之北。唐丰州也一度移此。

其实辽丰州治今呼和浩特市东郊白塔古城, 辽天德军也在此。这已为内蒙古文物考古所证实^⑤。那末, 辽与西夏边界在哪里呢? 包头市东郊阿都赖村和土默特右旗水涧沟门乡马留

村,近年来均出土过成罐或散落的西夏铁钱;在包头市区境内,迄今尚未发现过辽、金遗物。据此推断,辽夏边界,大端在包头市区之东^⑩。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(第六册)所绘辽西京道、金西京路都有错,把两国边界划得偏西了。

明确了边界方位,就易于找到黑山方位了。顾祖禹《读史方輿纪要》对黑山记述较详。他称:“黑山,在中受降城正北,稍东八十里,亦谓之杀狐山,亦谓之呼延谷”^⑪。

上述呼延谷,即今包头市昆都仑沟,黑山系指昆都仑沟以东的大青山和以北的色尔腾尔(唐牛头朝那山)。昆都仑沟以西是乌拉山,唐时称牟那山、纥那山,西夏时称午腊翦山。今狼山西北地区,即巴彦淖尔高原(包括今乌拉特中旗和乌拉特后旗大部),并无大山,是丘陵、戈壁、荒漠草原地带,仅乌中旗与蒙接壤处有索伦山,系浅山,乌后旗之北蒙古境内有呼赫乌拉山。

根据上述情况,狼山西北无黑山,黑山是在黄河之北,大青山和乌拉山北部,也正如《宋史》所说,“自河北至午腊翦山七万人”。这一带有无一座西夏古城呢?我们在考查汉长城时,发现在今乌拉特中旗新忽热乡所在地北2公里处有一古城,与之相当。古城呈长方形,东西约850米,南北约800米,北墙西墙已成土拢。四墙中各开一门,宽8米,外有瓮城,其侧有马面4处,高与城齐。城四角有角楼。基宽8.5米,顶宽1.5~2米,残高8.5米,东南角最高处8.5米,夯层15~20厘米。出土有瓮罐盆等。整个建筑形制与陈炳应先生所说的黑水城大体相似,但规模却大得多。是我们在阴山北部所见的多座古城中较大的一座。城内文物极少,巴彦淖尔盟文物部门普查中认定为金元时代古城。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(第二册)标为汉受降城。我已在《受降城与满夷谷》一文中辩其误^⑫。

新忽热古城正位于包头市正北略偏西160公里处,有大道可直达,座落在古牛头朝那山(今色尔腾山,为阴山北支)之北。古城东面契丹,北邻鞑靼(鞑靼在辽时隶属辽上京道),是成吉思汗从萨里川或黑林行宫径直南下,进攻西夏必经之地,也正符合比秋林说的“在长城中的通道”之义。因汉长城在古城之北20公里,秦长城在古城之南30多公里。我们在考查汉长城时还发现,西夏时曾加以利用,因沿线有西夏新修筑的障城,如乌拉特后旗乌力吉乡的苏亥古城,就是其中之一^⑬。

因此,我们判断新忽热乡古城,应是西夏兀刺海城,是西夏黑山威福军驻地。据此,我们返回头来研究成吉思汗第二、第三次进攻西夏的军事路线就较清晰了。

第二次,公元1207年“秋,征西夏,克斡罗孩(即兀刺海)城,次年三月返回”《亲征录》、《西夏书事》记事较详,说“蒙古驻斡罗孩城,四出侵掠,安全集右厢诸路兵以拒。蒙古主见夏国兵势尚盛,不敢骤进,逾五月,粮匱引还”^⑭。

数万夏兵防守偌大一个城寨,夏主李安全又调集右厢诸路军伸援,战事激烈程度可想而知。时间长达五月之久,西夏兵肯定损失惨重,蒙古兵死伤恐怕也不少,故尔,“不敢骤进,粮匱引还”,是合情合理的。

第三次,公元1209年战役,《太祖本纪》记载是“春三月,蒙古主入河西。……夏四月,攻兀刺海城,丰州谢睦劝守将出降,太傅訛答率兵巷战被俘,蒙古军攻下兀刺海城,并乘胜进军中兴府,攻贺兰山西的克夷门”^⑮。从兀刺海至克夷门,有两条道可行,一是沿狼山北的草原道路西行,再折而西南行;二是沿狼山南麓西南行。两条道均在今叮口县哈腾套海苏木西端会合,西行至贺兰山西麓南下。这两条道都是清代从武威至包头驼路的东段^⑯。蒙古

军破克夷门，进而围中兴府，逼水灌城，夏主李安全纳女求和。

第五次战役，《元史·太祖本纪》记载是非常合理的。“二十一年(公元1226年)春，帝以西夏纳仇人……自将伐之。二月取黑水城，夏避暑浑垂山，取甘、肃等州。秋，取西凉府、罗、河罗等县，遂踰沙陀，至黄河九渡，取应理等县。冬十一月庚申，帝攻灵州。次年帝留兵攻夏王城，自率师渡河攻积石州……六月，夏主李睨降”^②。

说《元史》记载合理，是因为它符合实际。从漠北南下，先取今额济纳旗的黑水城，消灭了西夏黑水镇燕军，然后沿额济纳河南下，到浑垂山避暑(浑垂山为祁连山中某山，系雪山)。从下文成吉思汗率兵攻甘、肃二州来看，浑垂山似应在甘、肃二州之南。屠寄《蒙兀儿史记》注说，浑垂山在凉州西南，王北辰教授认为即冷龙岭，似乎偏东了。《西夏书事》说在肃州北。肃州北的扫林山、黑山，海拔均在2500米以下，无积雪，更不确。成吉思汗避暑之后，即率师攻取甘、肃二州。王北辰教授认为是分军取甘、肃二州，与《元史》记载不符^③。蒙古军又东取西凉府(即武威)及其属县罗、河罗。再东行遂踰沙陀(今宁夏中宁县西腾格里沙漠南缘)，至黄河九渡，取应理县(今中卫县)等。冬十一月攻灵州，夏嵬名令公十万众来援，丙寅，帝渡河击夏师。《元史》中无取兀刺海城的记载。

《蒙古秘史》只记述了成吉思汗第三、第四、第五次征西夏，三四次还未记出师路线。第五次的行军路线是：成吉思汗营于斡斡儿合场(日本村上正二以为即罗、河罗，在武威之东)，趋阿剌筛(今贺兰山)，然后“成吉思汗自察速秃(即雪山)起行，克兀刺孩城，自兀刺孩城起行，破朵儿篾孩城(即灵州)”^④。《蒙古秘史》所记第五次进军路线，前后颠倒，十分混乱。从罗、河罗起程，先东北行攻贺兰山，后西去雪山避暑，再西北攻兀刺孩城，又东行攻灵州，不合逻辑。它很有可能是将第二、第三两次攻兀刺海城战役，包括攻贺兰山之战，都并入于第五次战役中记叙了。拉施特《史集》记为，“首先占领了甘州、肃州、河州和斡罗孩城，又围攻斡儿沙孩城(即灵州)”。《西夏纪》先按《元史》顺序排列成吉思汗的军事活动，可是攻兀刺海城时间无法安排，便移至次年(公元1227年)春，围攻中兴府之后^⑤。这更与史实相舛了。王北辰教授将成吉思汗行军路线安排为：先取黑水城，然后从石羊河南下直入凉州，登浑垂山避暑，分兵取甘、肃二州。也与《元史》不合，且从黑水城至石羊河必须越丹巴吉林沙漠，迄今仍无路可通。

弄清了二、三、五次战役的军事地理和路线后，研究第一、第四次军事路线，就比较容易了。

第一次战役，《元史·太祖本纪》云：“岁乙丑(公元1205年)，帝征西夏，拔力吉里寨，经落思城，大掠人民及其骆驼而还”。《西夏书事》记其事颇详，曰：三月，“蒙古初来侵，破力吉思寨，纵兵躏瓜、沙诸州，纯佑不敢拒。夏四月，蒙古主以天暑将盛，引兵还落思城，大掠人民及其骆驼而去。六月，纯佑以蒙古兵退，修复被兵诸城堡，大赦境内。更兴庆府为中兴府。”

拉施特《史集》记为：“成吉思汗整集军队去征讨被称做唐兀惕的合申地区〔他们进入该地区后〕，先到了力卜勒乞寨(即力吉里寨)……，在短时间内攻了下来，将寨墙和基础全部平毁。他们从那里进到克邻——罗失城(即落黑城)，这是座很大的城，他们攻下了它，进行了洗劫。〔接着〕他们又占领了唐兀惕若干其他地区，进行洗劫，并将那些地区我们找到的牲畜全部驱走”。

《蒙兀儿史记》记为甲子年(公元1204年),成吉思汗征乃蛮,杀太阳罕。冬过阿来岭(今新疆北部友谊峰),继续追太阳罕之子古出鲁克和篾儿乞酋长脱黑脱阿父子。脱黑脱阿死,汗亦还金山(今蒙古阿尔泰山)。因此,屠寄认为,乙丑年春(公元1205年),蒙古大军是还于兀鲁(黑)塔(黑)之地,在金山前(今蒙古科布多西北),因利乘便,踰漠南下入河西,进攻西夏。即第一次攻西夏。

这次攻西夏所经过的吉力里寨、落思城和乞邻古御城,皆不可考。所经过的路线中,也不见西夏北疆防御体系中的黑水镇燕、白马强镇、黑山威福三个军司之名。幸好《西夏书事》中透露了一点信息,说“纵兵躡瓜沙诸州”。它与屠寄所说“因利乘便”衔接起来了^③。这样我们便可作如是推测,成吉思汗踰金山后,系到河西走廊西端,先攻吉力里寨。这是蒙古军第一次进攻城镇,在此之前,都是与游牧民族在平川战斗。吉力里寨极坚固,虽然攻下来了,但却极费力,所以对西夏的沙、瓜、肃等军事重镇,便未组织进攻,只是“纵兵躡瓜、沙二州”。大约是从沙、瓜等州北部经过,攻击的是诸州外围的一些军事城堡。吉力里寨大约在沙州(今敦煌)西北,乞邻古御城约在沙、瓜二州之北,落思城在肃州之北。成吉思汗可能是循黑水西岸东北行,未经黑水城,退至漠北。

第四战役,《元史·太祖本纪》记载极简单。“十三年戊寅(公元1218年)伐西夏,围其王城。夏主李遵頊出走西凉”。《蒙兀儿史记》记为“十有二年(丁丑1217年),汗征西夏兵从征彻儿塔兀(勒),不应,遂伐西夏。十有三年(戊寅,1218年)春正月,围中兴府。夏主李遵頊命其子德旺居守,出走西凉。”《亲征录》、《史集》不载是年伐西夏事。《西夏纪》引《西夏书事》云,1217年,“蒙古兵围兴州,国主遵頊出走西凉。夏与蒙古自纳女请降,合兵攻金,遂为役属。继征发日多,不堪奔命,礼意渐疏。蒙古主怒,渡河来攻,列城不能御,直抵中兴府。围之,遵頊命太子德旺居守,已出走西凉。已而,遣使请降,蒙古兵退,始还”^④。

诸书所记基本相同,皆无出师地点和途经城镇名。只《西夏书事》道出一句十分可贵的话,“渡河来攻,列城不能御”。渡河,渡黄河。只有从东面进攻中兴府,才需渡黄河。这联系西夏主李遵頊出走西凉,正好相互印证。

成吉思汗南下侵金和攻西夏,在公元1215年前后,在策略上有较大变化。在此之前,进军主要是掳掠,不占领土地,蒙古军退走之后,所占地区城镇又被对方收复。1215年,成吉思汗采纳了石抹明安、王揖的建议,变屠杀为招降,金军望风迎降。同年,又将侵金之事委托给木华黎。木华黎采纳了金朝制度,在云、燕建行省,发兵南侵。这一策略上的变化十分重要,为彻底灭金、灭夏、灭南宋奠定了基础。

其次,经过第二、第三两次征西夏战役,西夏北疆防御体系基本破坏,兵力大大削弱。第三次战役后,西夏转而附蒙侵金,多次派兵进击金东胜、涇州、邠州、平凉府、庆阳、延安、临洮等地,又派大军随蒙古军南下潼关等地作战。金军反击,也重创夏军。所以夏国黄河南的左厢诸军司的实力这时已大大削弱了。

因此,1217年冬,成吉思汗从黑林行宫南下,渡黄河(当是踏冰过河),列城不能御,如入无人之境,直攻中兴府。这正反映了西夏军力衰弱的实际。蒙古军渡黄河攻中兴府,是渡的哪一段黄河呢?一般是渡灵州至石嘴山段黄河。从漠北南下,到这一段黄河,大约有两条道路。一是从今乌梁素海、西山嘴南下,入伊克昭盟,西南行;二是从包头昆都仑沟南

下,入伊克昭盟,西南行。当然,其他还有多条道路可行,但都绕道过远。沿上述道路到黄河东岸,过河攻中兴府是最捷近的路线,而且阻力也最小。因为黑山威福军司的力量已被彻底消灭了。王北辰教授认为这次可能是从雞鹿塞(今乌拉特后旗哈隆格乃山口)南下,“自北而南进攻中兴府”。但这条路线不渡黄河,与史文不符。

这次出兵,成吉思汗本拟一举消灭西夏的,但由于中兴府城坚固,一时难以攻下,夏主李遵瑱又逃至西凉州,西夏河西走廊诸军司还有一定实力可凭,若战斗处于胶触状况,便会影响筹备已就的大军西征。故尔当西夏再次请降后,便迅速撤军了。

此后,西夏军又多次被征调配合木华黎军进攻金国,实力更加削弱。因此,等到成吉思汗西征返回后,第五次征西夏时,采取从黑水城南下的策略,先消灭西部诸军司的军队,最后灭亡西夏,自然就水到渠成了。

注释:

- ① 蔡美彪、周清澍等著《中国通史》(第六册)158、191、192、193、197、198页,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。蒙古族简史组编写《蒙古族简史》47、52页,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1985年版。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第六册36—37图,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。王北辰《成吉思汗征伐西夏地理考》,载《内蒙古社会科学》1988年6期。陈炳应《西夏文物研究》81~104页,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。吴天禄《西夏史稿》124页,四川人民出版社,1980年版。《中国历史大辞典》“辽夏金元史”附图,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版。
- ② 《元史·太祖本纪》卷1,13、14页,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版。
- ③ 道润梯步译著《蒙古秘史》,续集卷一,355页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。《史集》第一卷第二分册第二编317页,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。戴锡章《西夏纪》卷28,674页。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。《蒙兀儿史记》卷3,40页,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版影印本。
- ④ 《元史·地理志》卷60,1452页。《西夏纪》卷6,156页。《中国通史》附在154页后。白滨《元昊传》附“西夏略图”,吉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。
- ⑤ 屠寄:《蒙兀儿史记》卷3,29页。《多桑蒙古史》,冯承钧,1934年译本,上册,57页,中华书局1962年版。王北辰《成吉思汗征伐西夏地理考》,载《内蒙古社会科学》1983年6期。
- ⑥ 《宋史·夏国传》卷486,14029页;卷485,13995页。中华书局点校本。1983年版。
- ⑦ 《西夏纪》卷6,156页,引《西夏书事》卷12。
- ⑧ 《中国通史》第六册153页。白滨《元昊传》47、43页。
- ⑨ 吴天禄:《西夏史稿》124页。
- ⑩ 陈炳应:《西夏文物研究》第十一章《〈西夏地形图〉初探》,433~453页。
- ⑪ 《辽史·地理志》卷41,4、5页,商务印书馆缩印百衲本二十四史,1955年版。
- ⑫ 李吉甫: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4,111~114页,中华书局1983年版。李逸友《呼和浩特市万部华严经塔的金元明各代题记》,《文物》1977年5期。洪用斌《元代德宁路考》,载《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纪念集刊》1979年9月。
- ⑬ 《包头文物资料》第一辑,张郁《从包头市东郊出土西夏铁币谈起》,金申《从阿都赖出土西夏铁币兼谈沙尔沁村的边墙》。

⑮新忽热古城，我们在考察中仅用步测，不准，此外是巴彦淖尔盟文物部门同志实测数据。鲍桐《受降城与藩夷谷》，载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1992年1期。

⑯盖山林、陆思贤：《湖裕旗朝鲁库伦汉代石城及其附近的长城》，载《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》，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。

⑰戴锡章：《西夏纪》卷26，631页。

⑱参《元史·太祖本纪》卷1，14页。《西夏纪》632~634页。《蒙兀儿史记》卷3，28、29页。

⑲参李万禄《瀚海长途一包武路》，载《阿拉善盟公路交通史资料选编》（第二辑）（内刊）。

⑳《元史·太祖本纪》卷1，23~24页。

㉑《元史·昔里铃部传·察罕传》卷122，3011页；卷100，2956页。

㉒《蒙古秘史》续集卷一，295、296页；卷二，351~357页。

㉓拉施特《史集》第一卷第一分册，317页。《西夏纪》卷23，670~673页。《蒙兀儿史记》卷3，40、41页。

㉔《元史·太祖本纪》卷1，13页。《史集》第一卷第二分册207页。《蒙兀儿史记》卷2，24、25页。《西夏纪》卷26，628页。

㉕《元史·太祖本纪》卷1，20页。《蒙兀儿史记》卷3，34、35页。《西夏纪》卷27，648页。

〔作者单位 内蒙古包头市人民政府史志办〕

（责任编辑 天明）



（上接第58页）

第三，要大力扭转社会风气。现在社会风气很不好，有些地方、有些领域，简直是到了风气败坏的程度。目前社会风气方面有四个最突出的问题或叫做“四害”。第一害是追钱拜金，不择手段；第二害是假风蔓延，骗子横行；第三害是显富摆阔，挥金如土；第四害是色情服务，黄潮汹涌。对这四害，现在要根除还为时尚早。但必须加以遏制，不能使其过分蔓延。

第四，要整顿执法队伍，实现司法独立。执法队伍素质提高了，司法独立有保障了，执法如山，法纪严明的局面才会形成。

第五，磨利法律之剑，做到令行禁止，法出罚随。

第六，坚持法制教育，培养法治观念。

我们要采取过硬措施，付出巨大努力，使我们国家尽快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过渡，早日进入法治国家的行列，以适应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需要。

〔作者单位 宁夏大学〕

（责任编辑 刘淑媛）